

■ 新作聚焦

曾有情、张子影长篇历史小说《里斯本丸悲歌》：

历史的铭刻与人性的洞察

□ 胡平

曾有情、张子影联袂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与杨怡芬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电影《东极岛》取材异曲同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打捞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更以独特的文学叙事，在历史与人性的交织中，实现了抗战题材创作的追求与突破，彰显了创作者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文学表现力。

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成果虽已颇丰，但仍有诸多历史角落有待挖掘。1942年10月1日的“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便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史实。日军将1816名英国战俘封闭于被美军潜艇击中的“里斯本丸”号底舱，对逃生的落海者残忍地开枪射杀，而中国东极岛渔民在日军的枪口下冒死营救，最终救出384名英军战俘。这一事件鲜明地展现了人性的善与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两位作者深挖这一题材进行创作，体现了其敏锐的文学嗅觉与历史责任感。

当东极岛洋面的血色浪涛淹没“里斯本丸”号时，历史在沉船上刻下了三重密码：日军铁蹄下的人性之恶、渔民舢板上的大爱之光，以及战争历史里的文明肌理。曾有情与张子影的《里斯本丸悲歌》，正是对这组密码的文学破译——它以史实为锚，以虚构为帆，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双重交汇的文本中，完成了一次对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双重叩问。

《里斯本丸悲歌》的价值正在于它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人性的解剖刀，更是文明的瞭望塔。在抗战题材创作仍需突破的今天，它证明好的战争文学，从不满足于复述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褶皱里，找到照亮当下的精神火炬。当东极岛的涛声依旧，那些渔民的身影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人类面对灾难时，永不沉没的精神舢板。《里斯本丸悲歌》的叙事智慧，恰恰体现在对史料的敬畏与超越的平衡术上。小说在史实与虚构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作者将1816名战俘的数字，10月1日的时间坐标，384名幸存者的结局等硬核史实，铸成了坚实的叙事骨架，为作品增添了难得的艺术品质。

真正彰显文学性的是作者对“历史缝隙”的填充艺术。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渔民“弃布救人”的集体行动中，作者巧妙地设置了施百志与英军战俘的棉布争夺战，自私的施百志原本只想捡拾沉船上的物品——漂浮海面的棉布包，并不想救人，而棉布包是一名落海战俘唯一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肯撒手，几经拉扯后，最终英军战俘有意松开了棉布包沉海而亡，放弃了他唯一的生存希望，为施百志抛出了一道人性考题，令他倍受触动，毅然加入到救人的行列。施百志的转变不是道德说教的产物，而是被死亡现场激活的生命觉醒，这种个体心理的微观叙事，释放出触及灵魂的生与死体验。

长篇小说本可为作家提供广阔想象空间，但作者并未过度铺张，而是尽可能保留原始记载，准确的时间、地点，具体的场景、细节，让作品具备了真实的价值和力量。同时，作者通过合理回溯、想象与整合，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特殊关头的不同表现，以及相互间的制约与冲击，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情境的复杂性，这种创作手法是对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真实”与“艺术”关系的准确把握。



《里斯本丸悲歌》曾有情、张子影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7月

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超越了一般抗战题材作品的深度。东极岛渔民本是普通百姓，在发现漂浮海面的棉布包时也曾万分欣喜，但遇到沉船落海的英军战俘后，他们抛弃已经捞上渔船的棉布包，为舢板腾出空间和载重，全力营救更多的陌生人。这种反差展现了在危难时刻人性中善良的本能与光辉。而日军疯狂扫射海中垂死挣扎的战俘，不仅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也从侧面揭示了日本战败的必然性。作者通过这种鲜明对比，直击人性本质，奠定了作品的深邃与厚重。

小说中三对男女的爱情刻画，是服务于思想表达与人物塑造的，增添了丰富的命运质感，也通过这些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众生处境及人们的精神风貌。青年渔民林海生和沈青梅本为青梅竹马，却因一起海上事故走上陌路。后来，在“里斯本丸”沉船灾难中，千钧一发之际，林海生不仅救了沈青梅，还出死入生拯救命悬一线的陌生人，令沈青梅深受触动，与他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在他们的感情交往里，浸润着渔家的伦理元素。老光棍施百志一直追求着朱东兰，却总被朱东兰拒绝，后来，施百志不仅勇救战俘，还在日军的屠刀下救了渔民，令朱东兰刮目相看并最终接纳了他。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谋篇时目光并不局限于那场灾难，而始终追求和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使得这部作品焕发出更加丰满的文学能量。陈阿蕾与威廉斯爱情故事的折射出中英两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香港医院护士陈阿蕾与英军驻港部队中尉威廉斯相恋，由于战争爆发被迫分离，威廉斯经历沉船，在与日寇的英勇斗争中魂归大海，独留下陈阿蕾终生守护这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这对男女爱情故事取材于当年的真实原型，读来让人动容。三对男女曲折情感的设置各含深意，深化了作品的反战主题。

当东极岛洋面的血色浪涛淹没“里斯本丸”号时，历史在沉船上刻下了三重密码：日军铁蹄下的人性之恶、渔民舢板上的大爱之光，以及战争历史里的文明肌理。曾有情与张子影的《里斯本丸悲歌》，正是对这组密码的文学破译——它以史实为锚，以虚构为帆，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双重交汇的文本中，完成了一次对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双重叩问。它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人性的解剖刀，更是文明的瞭望塔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作品深入剖析了渔民群体善良背后的文化根源。小说中关于“财伯公”的系列情节，为渔民的义举提供了文化注脚。财伯公原名陈财福，海中遇险后奋力自救上岸，从此，每逢雾天他都在山顶点燃柴火为附近船只引航避险，这种善举被渔民世代铭记，百年传颂，构成了“落海必救”的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作者对这种文化背景的深度挖掘，让渔民的自觉行动不再成为偶然，而是文化滋养下的必然。因此，为作品注入了深层价值，将一场区域性救援，升华为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镜像。

作品的尾声定格在2024年的跨国会面，当年英军战俘后代与救援渔民的后代相聚东极岛，在沉船之地举行海祭，他们以花瓣为载体，把感恩与追思永远留存在那片见证人光辉的海域，将历史与现实连接，让那段生死救援的往事在新时代焕发新机，也让两国友谊在历史记忆中得以延续，完成了文学命题的时空闭环，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寓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后记中罗列了一份统计于1948年、至今存于浙江省档案馆的史料。该史料记录了当年参与营救战俘的所有渔民名字。这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录，而是以史料的真实性佐证作品的历史根基，当200多个渔民的名字从岁月的尘埃中浮现出来，构成了有力的人性证词，这些朴实的渔民与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相互映照，证明文学的虚构从未脱离现实的土壤，而历史的真实也因文学的讲述获得艺术生命，那些平民英雄的人物形象在文字的雕刻下血肉丰满、光彩照人。

《里斯本丸悲歌》以娴熟的创作手法、深刻的人性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厚重的主题表达，为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

■ 创作谈

用小说的形式去再现一段悲壮的史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作家总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面临极大考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军旅作家，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用文学作品书写艰苦卓绝的抗战故事，诠释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为人类反侵略战争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程，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希望写一部内容较为独特的抗战献礼之作。经过反复研究，“里斯本丸”号沉没与营救事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83年前，日军征用货轮“里斯本丸”号，从香港运送1816名英军战俘回日本做苦力。因为没有按照《日内瓦公约》悬挂战俘标志，在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域，被美军“鲈鱼”号潜艇发射鱼雷击中。日军弃船之前，用木板和防水布将战俘封死在底舱内。24小时后船体彻底沉没，战俘不得不拼死自救逃生。面对手无寸铁、在海中垂死挣扎的战俘，日军企图全部消灭战俘以掩盖真相，他们开枪扫射、用舰船碾压战俘。在战俘生死存亡之际，东极岛渔民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冒死全力营救，最终384名战俘被渔民营救上岸。渔民自发的救援行动，被英国战俘丹尼斯·莫利称为“人性在至暗时刻的璀璨光芒”。

如今，“里斯本丸”号依然沉睡在浙江东极岛附近海域。它的残骸肯定已经难辨原貌，但它的悲壮并没有因为海水的荡涤而消亡，它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沉寂而淡化。这段历史有别于常见的抗战文艺作品，题材相对稀有独特，它是另一种战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抗战。

为创作这部作品，我们踏上了浙江舟山东极岛，接近“里斯本丸”事件现场，打捞那段被海水淹没的往昔。我们通过多日实地考察、专家座谈、走访当年营救战俘的渔民后代、参观“里斯本丸”事件营救纪念馆、研究大量文字及影像资料等方式，触摸80多年前的那段罪恶与正义交锋、残暴与大爱碰撞的疼痛历史。深怀对日军惨无人道暴行的灵魂之问，深怀对战争遭遇的悲悯之情，深怀对营救战俘渔民的崇敬之心，我们潜心创作，本着以小见大的创作思路，期待通过小事件反映烽火连天的大时代，着眼小切口展现全民抗战的大背景，塑造小人物进行生死营救的大情怀。

小说以“里斯本丸”号沉没的真实事件为背景，以东极岛渔民勇救落海战俘为素材，在整合、加工多方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塑造了林海生、沈青梅、施百志等东极渔民，陈阿蕾、波仔兄妹等港人代表，威廉斯·彼得、亨利·格雷西等英军战俘和秋野一郎等日军暴徒的形象。当然，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人物及名字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去掉这些真实人物，那段历史将变得苍白。在创作中，我们力求凸显小说的文本特质与内在结构，立足于文学性的深度开掘，通过精心编织复杂而立体的矛盾张力，力求让读者沉浸于故事之中，从而步入那段生动而厚重的沉船历史。

在小说叙事方式上，我们采取东极岛、香港、“里斯本丸”号航船等多地多线交叉叙事，把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与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紧密融合，让那艘深埋海底、定格在时间长河中的沉船，成为多条情感线与命运线交织的叙事锚点。

在塑造东极岛营救战俘渔民的形象方面，我们做了一番认真斟酌，出于对人物的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完整叙述考虑，主要人物无疑是虚构的。为了不遗漏每一个施救者的功绩，我们查阅到现存浙江省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东极岛参与营救战俘的渔民名录，为尊重每一位营救者，我们特意在后记中列出了所有参与营救的渔民名字和被救战俘人数，以此致敬那些大爱无疆的渔民。

一首沉船悲歌，一曲大爱颂歌

□ 曾有情 张子影

■ 短评

在细微处“行走”

——谈王江江的诗歌

□ 杨克

王江江的诗作总让人想起夜晚，沉静、幽深、纯粹。他的文字中常有月光般细腻的体察，有着星空般辽阔的观照，更有一种夜幕降临时的真实。一个人喜欢在夜晚行走、思考、创作，像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当白昼喧嚣散去，笔下的世界才慢慢苏醒。他倾听夜晚的呢喃：路灯下漂泊的行人、街角醒着的流浪猫，甚至还有千年流淌的河水中映出的月光碎片。这些细节在他笔下总能跃然纸上，连接过去与未来。

王江江的写作与他供职的自然资源部门有关，如同植物一般生长在生态与自然之间。他敏锐于现代都市的种种失衡，如同护林员般耐心地守候着生态的疗愈。他的语言节制，但气韵贯通，有一种直抵内心的勇气。就其风格而言，王江江的诗如藏匿于现实细节中的谜题，初读时似乎直白简洁，却在回味时留下回响。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图景，以陌生化的意象重构出一个富有哲思与诗性张力的场景。其诗歌总体可概括为四个特点：意象的精准与陌生化、情绪的克制与哲思性、语言的精炼与节制、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

王江江的诗句短促而有力，意象之间的碰撞令人回味。在《密码锁》中，他写道：“杨树如指针，拨弄着星空的坐标”，树木被赋予了时间感，空间和时间的交错在此巧妙呈现；诗句“一只孤虫背着黑色的斑点起飞”，极其微小的事物折射出通向“过去的门”，历史在当下苏醒，为读者留下丰富的阐释空间。

情绪上的克制与哲思性在他的诗中处处可见。诗人总是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表达深沉的情感和思考。在《睡着的骑手》中，骑手的睡姿简单而放松，他关心最普通的劳动者——当下最常见的快递员，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剪影：“一个平常的午后，他睡着了/双脚交叉，搭在车把上/双手抱胸，头后仰，枕着外卖箱/只用很小部分的身体接触世界/他双目微闭，不再向上看/天空是一张跑不完的线路图/一个平常的午后，他睡着了/人们发现他的时间/他以最舒服的姿势睡着了/双脚交叉，双手抱胸/像一条被拧干的毛巾。”诗句不煽情、不贩卖苦难，只是呈现生命的一种状态。《智齿与控马桩》中有：“多余的部分，总使人从遥远的梦中醒来”，遗忘与记忆、疼痛与清醒之间形成的哲学对话，体现出诗人对生活的理性而不失温情的观察。

此外，王江江的诗作也呈现出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在《祁连山》中：“石头被射中，人们从硬盘里取出无尾草”，现实与历史的界限在意象之间被巧妙打破，呈现出历史与现代的并置。这种手法类似于碎片拼贴技术，通过历史、记忆、现实的意象并置，创造出强大的张力。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交织，表现诗人对个体命运与历史境遇之间关系的思考。他的诗歌还体现了对都市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反思。他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极富质感的描绘，揭示了现代都市人不停奔波的生存状态。在《莫尼路》中，“搪瓷盆孤零零在我家中，我孤零零在人海中”，诗人巧妙利用事物的消逝与遗忘，表达了个体生命在时光中的迷茫。

王江江喜欢贴近土地，关注被遗忘的村落、失眠的都市青年，写那些漂泊的身影和淡淡的乡愁。他不恐惧矛盾，也不回避焦虑，而是用朴素的语言、准确的描述，把社会细节化，进而在细节里探寻希望，于日常中唤醒人心。他的文字充满质感，就像我曾经说过的，“眼睛往低处看，灵魂在枝上飞”，王江江用平实的视角，把生命梳理成一首柔韧的诗。未来，他的文字会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时代的纹理。他用文字做那条在细微处“行走”的河，让个人的书写与时代同行，让日常的光亮成为多数人的共鸣，就像点燃一盏灯，在平凡的黑夜中，引出温暖，也照亮前行的路。（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向过往呼喊、向身边探索、向内心叩问

□ 李好

时间是块橡皮擦，记忆则是试图在擦痕上重绘轮廓的笔。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所写：“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已铸就的过去，但一切过去都将被遗忘。”当时间以不可逆的姿态持续冲刷生命的岩石，“挽回”便成了永恒的精神症候：不是执着于对逝去时光的复刻，而是关注于寻找意义之所在。人们一次次透过蒙着雾的窗，在清晨消散的水汽中将其打捞，与“无法挽回”与“不愿遗忘”的拉扯里，生命最本真的重量得以呈现。

石钟山的《向我开炮》（《上海文学》2025年第9期）便着墨于身份无法被证明之困局。作家以惨痛的战争为故事讲述的起点；连队其他战友全军覆没，导致马德全失去了直接的身份佐证。当《英雄儿女》将历史记忆拉回现实，马德全的一次次“眺望”终于换来了强烈白炽灯下的重逢时刻，在观众与摄影机的瞩目中，他不仅被正式确认了革命英雄的身份，更得到了“向我开炮”的回应。故事背后锚定真实的英雄原型——至少有于树昌、蒋庆荣两位革命战士的事迹可考。本文叙事巧思在于：全篇以速写式手法书就，在主人公生命的关键轨迹间实现跳笔，讲述者始终作为旁观者、记录者，与故事主人公保持距离；不介入人物内心，不追加价值评判，呈现出特意保留的粗粝的时代画像。这种写法在触及历史深度时显露出某种克制的姿态，保留一定的“距离”，让作品留有“呼吸”的空间。

《作家》2025年第9期刊发的林东林的短篇小说《俺老孙来也》也呈现出了这种写作倾向。小说以“在景区扮演齐天大圣”作为与日常现实对照的理想型工作，通过不断回溯，主人公的关注点被伸展至儿时扮演孙悟空的记忆——孙悟空作为反叛秩序、确证自身的文化偶像，成为“我”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意义的价值出口，赋予“我”坚守新闻从业者底线的勇气和力量。小说以大量篇幅展开情节，达到高潮后迅速收束，落笔于充满象征性的不断驶向远方的姿态。前方是成功的未来，还是引人怀恋的过去？作者没有写明，而是留给读者

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座头鲸》（《收获》2025年第5期）以“我”为叙述视角，将时代变迁的琐碎肌理一一串联。13岁那年看过《骑鲸的少女》后，“我”的堂兄檀洋仿佛着了魔，从此迷上座头鲸，甚至幻想疏通沙河连接大海，让座头鲸来到长水村。在一次国营渔业公司选拔海洋捕捞水手时，堂兄意外输给了“我”。三年后，“我”结束水手生涯回家与前来报恩的盛家女许涛结婚。许涛无法适应陆地上的生活，向往往大海的堂兄志趣相投，两人划舟私奔，加入国际环保组织，救助被藤壶折磨的座头鲸。作品的历史真实感越厚重，三人故事的传奇色彩就越浓。舒洁的《岩画中的羊群》（《上海文学》2025年第9期）是一篇以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以双重故事嵌套的结构延续并深化了虚幻的体认：一边是阿日斯兰一家的鲜活现实，一边是世代流传的毡子山传说，遥远的神话叙事与当下的生存图景彼此渗透，构成草原记忆中不可分割的存在部分，也让民族视角下的记忆书写，多了一层自然与神性交融的独特质感。

与面向过往的呼喊同时存在的，是对“身边”的重新关注。曹军庆的中篇小说《清吉人生》（《芳草》2025年第4期）将目光投至身边人，勾勒出余明涛、沈梨等个体的复杂性。于“我”而言，“重拾身边”的意义并非只是人际观察或生活所迫，更在经由余明涛的故事读懂沈梨、重新接纳生活的失败，最终触摸到永恒洞洞里“清吉人生”的温暖底色。同样关注身边之“他人”的还有哲贵的《造车记》（《收获》2025年第5期），作者以“新闻记者”这一外在身份进入，既以调查者的视角赋予故事真实性，又巧妙形成间离效果，“我”显然未能回答“钱大同为什么要造车”的问题。与车里的秘密同样迷人的是钱惠与池塘中的天鹅，钱惠相信“我爸刚骑着天鹅来看我”，带着童真与虚幻的场景将新闻的真实与想象的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目光若再向内收拢，落向现实的“自我”，便

会撞见更幽深的迷茫，过往的选择与当下的模样时常错位，曾经笃信的价值标尺也可能在时光里悄然偏移。人们是否真的了解那个在岁月中不断变化的自己？喻言的《高教授情史》（《作家》2025年第9期）给出的答案显然并不积极，与逐渐成为“人生赢家”的高教授相比，其心理学专业出身的女友显然对他更为了解，迎着缓缓走来的大团圆结局，小说却设置了一个逃离的时刻，放逐了积极意义上的自我了解、自我重塑，将获得世俗意义圆满的寄托付之东流。

处于生活节奏加快、价值判断多元的时代，“自我认知与心理状态的失衡”早已不是少数人的困境，反而成为现实中愈发普遍的心理议题。我们如何判断出高教授的细微变化？马亿的《目击者》（《芳草》2025年第4期）便以悬念叙事给出了答案，只有儿子意识到“她的眼睛很不一样”，那双被反复书写的“眼睛”，不仅是推动悬疑的叙事线索，更成了洞察人物内心的媒介，对异于常人的眼神的细微察觉，正是直面心理议题的第一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梁鸿的作品《要有光》（《收获》2025年第5期），她以互文性的写作策略将原始材料交织，形成多声部的对话空间，使生命的复杂性得以更为完整的呈现，为探究青少年心理问题写下了厚重注脚。

“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那些遗忘中坚守的碎片、现实中挣扎的灵魂、记忆中摇摆的自我，看似被时间冲刷得模糊，却最终在向过往呼喊、向身边探索、向内心叩问的旅程中，淬炼为带着韧性的玫瑰，绽放出厚重与芬芳。（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